

搭好台才能唱好戏

二〇一九年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随想

游 曙 之

方面要求也是非常之高。近年来,歌剧演出和创作的热潮催生了很多新作品的诞生,但是真正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毕竟还是少数。参加本次展演的这7部作品,都在一度创作或二度呈现上,体现出了一定的专业水准。而三部滚动资助的作品《马向阳下乡记》《松毛岭之恋》《有爱才有家》也在反复打磨中,日趋完善、成熟。与此同时,通过剧目的创作演出,各地的演职队伍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值得一提的,山东歌舞剧院趁着民族歌剧《沂蒙山》入选“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的大好机遇,组建了专业合唱团,补充队伍,完善编制,为今后本地歌剧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做法也值得很多在硬件上还欠账的院团学习借鉴。

再次是坚持专家跟踪指导。有针对性地创作把脉。“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从开展以来,就对作品的艺术质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加之工程集结了很多有经验的专家,因此,在工程初始就实行“专家跟踪指导”的举措。“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指导委员会的专家会从一度的剧本、音乐创作,到二度的舞台呈现,对每一部剧目分阶段进行指导,对于创作中出现的问题随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措施、方法,力争让每部作品做到“三审三改”,确保创作的有的放矢。

在今年5月份上海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中的《马向阳下乡记》《松毛岭之恋》《英雄》三部作品同时入选本届艺术节参演剧目,角逐文华大奖,最终谁能“蟾宫折桂”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三部剧均来自工程,足见其成效可观。

从第三届中国歌剧院,到连续多次具有一定规模的民族歌剧展演,这种高频率的演出机会,对于进入“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的扶持剧目来说,是非常难得且珍贵的机会。近年来,我们看到太多的歌剧创作,首演之后便刀枪入库,再无踪迹。如果本身艺术质量差强人意,无缘舞台也属正常;但是很多创作演出不乏潜力甚至优良之作,为何也会销声匿迹,就值得业界关注了。事实上,因为歌剧的综合性特点,所以其创作出来之后,演出常常是一件令院团或演出团体倍感尴尬的事情。除了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还有一点就是没有场地。中国的歌剧院团具有自主演出场地的凤毛麟角,而租借场地的高额费用,也会让很多院团权衡再三之后却步。但是对于歌剧艺术创作来说,舞台是唯一的检验地和生存地,离开舞台的歌剧,都只不过是“纸上谈艺”罢了。

所以,有戏还得有舞台。“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对于入选作品最有力度的支持,正是给予这些新作品的国家级展示平台。参加今年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的7部作品,诞生时间最长的不过两年多一点,最短的也就几个月,“小小年纪”却已经是“久经沙场”。很多新作品不仅能在国家级平台上展示,各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也逐渐加大,各种演出的机会逐渐增多。一部新的歌剧作品诞生之后,只有多演,才能在反复实践中得到检验,同时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不断修磨,力成精品。最重要的是,舞台拉近了这些作品与普通观众的距离,观众能够在第一时间欣赏到当今最新的歌剧创作,而观众的反响也会对这些作品以及今后的歌剧创作方向给以鼓励或反思。

“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不仅推动了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同时对于国内歌剧事业发展的整体业态也形成了良性的促动。仅2018年,除了前述的7部作品,全国各地还有多部歌剧新作推出。比如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画皮》、福建歌舞剧院的《与妻书》、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玉堂春》、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包青天》、广州大剧院的《马可·波罗》、上海歌剧院的《晨钟》、浙江歌舞剧院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郴州民族歌剧团的《陈家大屋》、衡阳歌舞剧院的《田垄之上》等,这些作品和展演上的新作一样,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今中国歌剧创作和演出的发展形态。

以文化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和“优秀民族歌剧展演”,都是政府搭台,前者好比是“民族歌剧事业”的舞台,后者就是“民族歌剧演出”的舞台,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所谓“搭好台才能唱好戏”,最终能出佳作流传开来,传承下去,就是硬道理。

中国文化的现代经验

杨佳艺 张慧瑜

100年前,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一场深远地改变了现代中国走向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有3个层面,一是作为政治的五四运动,指一战结束后爱国青年与进步知识分子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卖国条约的爱国运动,二是作为新文化的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反对封建文化、追求现代文化的进程,三是作为新思想的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随后中国共产党诞生,并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五四运动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品格,就是对外反对帝国列强的压迫,对内反对封建专制的统治,也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

“五四”以来的文化发展,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相结合的过程。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彻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由此中国文化开始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

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当时社会上尊孔复古的逆流,新文化运动高举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为国民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文言合一”的主张,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而陈独秀也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建设“国民文学”的观点。不同于古典文学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常见故事,现代文学将目光投向了社会的底层民众,致力于揭露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以唤醒国民的独立和自由精神。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便是早期新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启蒙”与“救亡”互相促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走出了封闭的沉疴而站到了世界面前。

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则展现出了一副新的面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则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结合提供了契机。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传播的主要内容。此后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相继成立,并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等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刊物,由此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组织。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文艺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经验。无论是在国民革命和十年对峙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工农运动的结合及对革命的操

演都有力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化的传播。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深化了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即确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和文艺工作者的人民大众立场。由此“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民族化和大众化的方向上迈出了新步伐,产生了无数反映革命斗争和工农兵生活的优秀作品,如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歌剧《白毛女》等,为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事实上,“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中。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得以彰显,文艺工作者也更加贴近现实和群众的方式,创作出了更具思想深度的作品,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文艺精神和传统。直至今日,革命的文化传统依然是当代文化的主旋律之一。

回首“五四”的百年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中国文化艰难而又坚韧的现代化过程。正是在民族危难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被打上了深深的“救亡”烙印,并在精神内涵和审美形式上都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可以说,爱国主义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底色。而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变化,则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我们不仅需要西方的理念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更需要考虑到中国的独特情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方能重新建构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实现中国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文化体制深入改革以及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正是凭借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新世纪以来文化市场呈现一片崭新面貌。政府一方面对能够市场化发展的文化领域进行大胆改革,促进民营资本成为文化市场的重要力量,如影视、互联网行业等,另一方面对那些很难有市场收益,又对国家、百姓有深远影响的文化艺术形态进行保护和扶持,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艺术的基本生态发生了巨大变迁,形成了两种文化景观,一种是各种文化产品的繁荣,不管是出版、演艺等传统文艺形式,还是网络文学、二次元文化、网络游戏等数字时代的文艺;二是建立了各级非遗传承保护体系和图书馆、博物馆、农村数字公益电影放映工程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惠及更多基层群众。

对于当下的主流文化市场而言,

有3个基本特征:一是,国家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是文艺生产的出资人和生产者,更多地扮演着管理者、监管者的角色,为文艺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二是,文艺生产的主体也从体制化的文艺工作者变成依靠市场养活的艺人,市场效益成为文艺生产的重要指挥棒;三是,观众与文艺作品的关系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市场关系。也就是说,国家负责把关,市场负责生产,观众负责消费,这成为文化生产的基本格局。不过,文艺不是一般的商品,它承载着民族文化记忆,影响着人的精神面貌,承担着文化软实力、国家形象,更涉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借用两句古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里的“文章”也可以换为一般的文艺作品。这两句诗说明两个道理,一是文艺是传之千古的事业,不可小觑,二是一得一失,只有创作者才能明白,而创作者对从事文艺创作也要心怀敬畏之心,对得起“天地良心”。

好的文艺作品可以流芳百世,对后人和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华民族能够传承至今,离不开坚韧不拔、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的积淀,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当然,强调“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一种外在的、僵硬的说教。文艺的特点恰好是寓教于乐、润物细无声,这也正是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优势所在,也只有春风化雨,才能真正地深入人心。

可以说,通过40年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起飞,从传统中国变成现代中国。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使得几亿人变成工业人口,如此短的时期、实现如此大规模的现代化,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意味着近代以来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前提发生了变化,这既需要改变那种对传统中国的武断批判态度,又需要调整对西方现代性的盲目崇拜。这种混合了悠久的古代文明、不屈不挠的现代精神和经济硬实力的当代中国,确实是一种近代以来完全崭新的经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开始扭转百余年来激烈的反传统和自我否定,尝试“回收”、追认曾经被遗忘的灿烂与辉煌。于是,这种崭新的文化经验,显示了中国克服了近代以来的文化自卑感和现代焦虑感,开始用现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来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纪念五四运动 发扬五四精神”

更加重视博物馆藏品衍生品开发利用中的产权保护

黄玉辉

博物馆不仅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智力创造成果的集中收藏场所,更是这些智力创造成果的集中展示平台,担负着对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保护与传播职责。博物馆藏品衍生品是向公众展示这些文明成就的有效媒介之一,而知识产权是对智力创造成果的专有性权利,在博物馆藏品衍生品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应当把知识产权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对衍生品创作过程中产生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在创作和利用衍生品过程中,要有防止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风险防控措施。

注重知识产权各环节各方面的工作内容。知识产权工作应体现在与衍生品相关的各个方面的保护,应当贯穿于衍生品创作和传播的全过程。从以往博物馆涉及的著作权诉讼案件来看,案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一是他人使用博物馆出版物,侵犯了博物馆的著作权;二是博物馆与他人合作开发的影像产品或出版物的权属纠纷;三是博物馆使用的影像、设计等涉及他人著作权时的纠纷。因此,在衍生品的创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著作权保护问题,必要时对一些重要的作品进行著作权登记。对于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可以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在复制藏品或创作衍生品的过程中,如果开发出了有价值的新技术,应当及时申请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积极将具有特定含义和价值的文字、图形注册为商标以获得保护,并在开发衍生品的过程中,规范这些标识的使用,使之达到提升品牌形象的目的。在与人合作开发时,对于权利的归属、利益的分配、商标和其他标识的使用都要进行明确的约定,防止不必要的纠纷出现。在授权许可、展示、出版、销售时,也要对权利进行合理的制约,充分保护知识产权。同时,在衍生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要注意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防止贬损、歪曲使用等

情形的发生。此外,在衍生品开发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规范对外来素材的使用,查询涉及的作品、技术的来源和知识产权状态,并进行可追溯的记录,防止侵犯他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同时,不仅应当注意自身开发的产品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也应当充分审查合作开发者或受委托开发的机构或个人的创作成果是否涉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问题。

重视知识产权的运用和经营。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立,其最终目的是促进智力创造成果的传播。博物馆藏品衍生品的知识产权工作,也应当注意这一点。首先,博物馆作为中华历史文明的成果载体,有义务向世界展示这些优秀的智慧成果,而衍生品正是一个有效的展示媒介;其次,博物馆的藏品作为艺术作品,大多数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不再受著作权保护,应当为公众自由学习和了解,衍生品知识产权的保护过程中,不能使公众对这些知识的获取产生阻碍;再次,衍生品知识产权的利用和传播,也是有效提高博物馆收入的方式,可以使得博物院有更丰富的资源进行藏品的收集、修复、保护和展示工作。所以,在衍生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各种方式对它所承载的艺术成就进行推广。衍生品的经营,不应局限于产品的销售,而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知识产权的运营。比如,在修复和复制藏品的过程中所开发出的新颖性和创新性的工艺,可以申请专利并通过许可的方式推广使用;再如,与藏品有关的独特设计可以许可其他厂商用于相关的商品设计等。此外,博物馆也应当重视自身品牌建设。比如,为树立鲜明独特的公众形象,实施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广泛适用于公文、证件、标牌、旗帜、办公用品、环境布置等方面,并制定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使用管理办法,对其使用进行管理。这些都是知识产

权的有效运用方式。

扩大知识产权工作的覆盖范围。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是一个系统工作,而衍生品的开发和传播也并非单一部门的工作,所以必须在部门分工、工作流程等方面细化知识产权工作程序。在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对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进行规划,知识产权工作在机构设置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有效布局,并力争做到全覆盖。同时,制定详细的知识产权查询、保护、保险、风险防范工作制度 and 问责机制。在档案管理部门、新闻宣传部门、信息网络部门中,均应按规定知识产权相关问题上的职责与工作流程。这样,衍生品从立项到创作、生产、经营等各个环节和参与的部门都可以有效避免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且有助于挖掘可能的知识产权运营亮点。

2016年3月8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博物馆工作的指导意见》重点指出了博物馆藏品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早在200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博物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中就指出,知识产权在博物馆进行藏品的搜集、保护和管理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版权和商标权,在满足使用者需求过程中其重要性逐渐增长。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可以使博物馆利用网络,让其成为教育和交流的工具。博物馆汇集了我国漫长历史进程中大量的文化瑰宝,同时也肩负着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与传播中国文明成就的任务。以藏品衍生品为媒介的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必须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通过知识产品的创作和使用,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和传播中国历史文明进程中的优秀智慧成果,还可以提高博物馆的品牌声誉与影响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